



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家伦理反思（景海峰）

(2006-11-2 15:14:07)

作者：景海峰

而已。所以，“它的显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①这里，黑格尔仅为一例（当然他后来影响巨大，通过马克思这一中间环节对现代中国的“自我”认知起到了根本形塑的作用），19世纪以来的一流欧洲思想家，差不多都把儒家伦理当作“先进的欧洲”之“反面教员”来加以嘲弄，对其稍具好感的，实在难得一见。这种“欧洲中心主义”之立场背景下的判断与评论，正像萨义德（Edward Said）在批判“东方主义”时所描述的那样：“东方学话语，其内在一致性，其严格的程序，都是为西方读者和消费者设计的。”^②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所占有的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和牢牢控制着的话语霸权，使得他们对异邦所作的描述和极尽能事之相象，早已经成为具有某种先导性的范式，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叙事，也引导了被他们所描述的那些群体自身对于“自我”的认知。西学观照下的儒家伦理表达当然也不例外。

这样，在扭曲化的内部批判和复杂的外部因素的多重影响下，儒家伦理的现代叙述变得日渐地苍白，我们已实在不知道还有哪些可以说，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说！现实生活中的空洞化和陌生化，以及理论研究上的“失语”乃至“胡言乱语”，使得儒家伦理根本远离了我们的实际生活，以至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在内外比照的强烈反差底下，我们才能逐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有关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的讨论，唤醒了人们长期沉埋心底的文化本根的意识，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夹层”之间看到了可以往来的孔道，重新找回了面对儒家伦理时的某种现实感。继之大规模的对外交流，与港台海外华人地区的深入接触和了解，东亚社会（特别是韩国）所带来的刺激，使得我们深深感觉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为什么他们没有将传统“清理”出场，而照样实现了现代化？为什么我们视之如敝履的儒家伦理不但没有成为这些地区发展的障碍和包袱，反倒成了促进社会和谐与文化创新的动力？这来自于外部的警醒与激荡，成为了开启内心埋没已久的“自我”意识的重要媒介，让我们大家换了一种眼光，来重新打量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儒家伦理。就拿近些年来大为流行的“韩剧”来说，除了时尚文化的因素之外，道德意义上的强烈对比感和心理反差所激发出来的思考，以及从内心深处所唤起的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实在可以看作是儒家伦理思想成功“反哺”的一大实例。正是在面对外部的世界、在“身临其境”般的比照之后，我们对儒家伦理的认识才有了新的变化，才能从长时间的“彻底决裂”的历史阴影中慢慢地走了出来。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一方面是高度的趋同性和万物“毕同毕异”式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离散化”效应的加剧，这可以说是“全球化”自身所蕴涵的悖论。就文明形态而言，经济一体化和生活同质化所激荡起来的文化自觉、寻根意识和身份认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来得如此之强烈，这些意向或机缘将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由此我们说，全球化绝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而只可能是传统的改变。儒家伦理在面对新的挑战之前，先要作一番历史的清理工作，尤其需要从近代以来内外夹击所形成的“妖魔化”处境之中脱身出来，变换声誉，以取得起码的“出场”资格。这就需要我们学理上、观念上，乃至基本的叙事框架上，来重新地考量它，并需要对其概念范畴、问题向度、思想脉络和历史情景作更加细致和更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只有在转换了现行的面对方式以及处理的办法之后，儒家伦理的价值和意义才有可能得以充分地展示，它的合理性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说明。而激活儒家伦理之新的力量，除了现实生活中的有心挖掘、努力涵育、不断培植和社会风尚方面的大力倡扬、典范导引之外，亟需要在学理层面上来一番重新塑造。这包括要克服长期以来的批判氛围所导致的疏离感，以及心理认同方面的种种障碍，重新地以同情理解之姿态来肯定其正面的价值和意义，从而逐步确立起儒家伦理叙述与表达“自作主宰”的主体性。系统的重构和叙事的转向能够在当今出现，对于经济崛起的中国来说，这是文化上展现“自我”形象、并进而实现自我伸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关闭窗口\]](#)